

# 关于胡开文徽墨的年代辨析问题

## The Dating of Hui Inksticks with the Seal Mark of "Hu Kaiwen"

林 欢

Lin Huan

### 内容提要：

本文从故宫博物院所藏署款胡开文墨出发，将胡开文墨的款识特征和风格演变进行了归纳和总结，特别是对伪年款的类型进行专门分析，试图解决晚清胡开文徽墨中真假年款并存的问题。胡开文制墨家族的徽墨制造不仅有着胡开文后人对于祖先制墨历史的回忆和制造早晚时间上的分期，而且还是彼此之间经济利益的竞争加剧的表现。这一转折既有署款风格上的变化，也有大时代背景的巨变。

### 关键词：

胡开文 徽墨 款识 伪款

### ABSTRACT:

Based on survey of the inksticks with the seal mark of "Hu Kaiwen" in the Palace Museum collection, the article summarizes the features of Hu Kaiwen's seal mark and the stylistic transformations it went through. In the meantime, the article also specially analyzes different types of falsified year marks in an effort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coexistence of authentic and falsified year marks on inksticks made in Hu's factory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1644-1911). The Hui ink production for the Hu family not only reflects the later generations' commemoration of their ancestor but also involves the watershed in the dating of the inksticks' production. Moreover, it reflects the intensification of business competition and commercial interests. The turning point is concerned with stylistic changes of the seal mark as well as with tremendous changes of the epoch.

### KEY WORDS:

Hu Kaiwen, Hui ink, seal mark, falsified marks

胡开文墨业创始于乾隆三十年(1765)。自其产生后二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到同治、光绪年间,其墨畅行于大江南北。在故宫博物院目前所藏胡开文墨中,总共具有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和宣统七个年款出现。胡开文墨数量大,且署款方式、造型特征,装饰面貌等千差万别。在不同时期均有新的品种出现,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时代风格。本文拟从故宫所藏胡开文墨中署有不同年款的典型墨品中分别选取数例,以说明胡开文墨中所涉及的年款真伪问题。

## 一 胡开文墨的年代分期与工艺特点

在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众多具有明确胡开文纪年款徽墨中,具有早期胡开文真款的墨品为数很少。其大部分为同治、光绪时期胡开文后人托古制品。

### (一) 道光 (1821 ~ 1850)

有“道光”纪年胡开文墨的年代判定是疑点和难点最多的。在这一时期,胡开文墨业历代传人中符合时代条件的只有休城(海阳)店第三代传人胡锡熊(1803 ~ 1862;时年18 ~ 47岁)一位,第四代胡贞观(1825 ~ 1879;时年4 ~ 25岁)尚在读取功名,其弟胡贞乾虽也属此时间范围,但是年纪尚小。从目前故宫博物院现存胡开文墨的情况来看,凡署有“道光”字样的墨品既有别于乾隆、嘉庆,又不同于同治、光绪的设计风格。特别是此时模仿内廷设计的胡墨尚未被发现。不过当时胡墨的文人订制品已经大量出现且制作较为精细。从内容上来看,尤其以表现文人友情及共同制墨经历的主题在道光晚期数量较多。至于墨的造型,则以无边框的长方式最为常见,同时碑形墨亦有出现。设计者们在狭小的墨面上巧作图案,装饰构图疏朗。题材多为写意风格的吉祥图案或典故传说、风景人物、花草鱼虫等,如金壶仙液、松鹤延年、海水云龙、日月合璧等。

关于纪年款:此间多使用《尔雅·释天》中所用古纪年法,如“柔兆敦牂(丙午,二十六年,1846)”、“摄篆其昌(丁未,二十七年,1847)”、“疆圉协洽(丁未,二十七年,1847)”等。另外兼有“道光××年”款识。同时,一些墨品署有楷书字体“徽州胡开文造/制”字样,规矩工整,并多有“苍珮室”钤记。这是我们研究道光时期的徽墨制作及风格特征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相对而言,在故宫所藏胡开文墨中,署“道光”年款的墨品数量并不多。其中可以肯定的是单纯署有“苍珮室”款墨。其原因在于大多数地名款识与道光年代不符,故其制品大多有后代仿制的怀疑。如“汉安晏氏珍藏”墨,其背面题为“仿晋人漆烟法(道光丙午春蔗乡于新安之白岳峰头选烟自制)”,又“恩福轩珍藏”墨,其背面题为“道光丙午仲春月制/栗小园持赠”等,其款皆为“徽州休城胡开文造”。而“休城”作为分店标志的地名款,乃相对于同治之后遍布全国的胡开文墨店而言。在此之前其墨业尚未走出徽州,尚无多大名气。故而凡带有“休城”字样道光年款胡墨,皆有待于做进一步的探讨。

### (二) 咸丰 (1851 ~ 1861)

属于此时间范围的休城(海阳)店传人依然是胡锡熊(1803 ~ 1862;时年48 ~ 58岁);第四代传人胡

贞观(1825~1879;时年25~36岁)等。与乾、嘉时期相比,故宫所藏此时胡开文墨不见集锦墨踪迹。从咸丰到同治初年,由于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徽州地区的制墨业整体处于凋敝状态,例如,汪近圣停业,曹素功于同治三年(1864)迁往上海。唯有胡开文墨业尚存且继续保持生产。故传世的清代徽墨中署咸丰年款的徽墨较少,且多数署胡开文款。此时文人墨造型以长方式或柱式较多,数量有限,但制作较精美。

这一时期胡墨多具“咸丰××年制”纪年款,其字体印制规矩。其间墨的雕刻内容多受文人订制作品严谨规矩的约束,装饰图案较为简单,多为文字装饰。如胡贞观“鉴水斋珍藏”墨<sup>1</sup>等。除传统的文人题材外,多具有文人将领的政治抱负以及忠君报国的经世致用气息。如吴坤修“开诚布公”墨等一匣四笏,侧款分别为“咸丰十年又三月”及“海阳苍珮室选烟”。这些墨都是他在驰援徽州时做的。又如“怡湘使者”墨,正面上端楷书阴纹“必”字一,下小注三行“楚南怡湘使者于咸丰九年(1859)援新安时所置墨。”<sup>2</sup>此墨为外乡人在徽州从军时订制,反映了当时订制者良好的学术修养和文人情怀。它们在战后带出徽州,因而具有一定的推广意味。

### (三) 同治(1862~1874)

符合此时间范围的有休城(海阳)店第四代传人胡贞观(1825~1879;时年36~49岁);第五代胡祥禾(1851~1899;时年11~23岁)等。

有清一代,胡开文墨业在全国的发展肇自同治朝,相对于咸丰之前呈现出一种爆发式增长的趋势。故而胡开文存世墨以同、光时期为多。除了休城胡开文之外,又有屯溪胡开文、休城胡子卿、芜湖胡开文沅记等家支墨店纷纷独立开业。

同治时的徽墨生产规模数量最大,品种繁多,造型新奇。文人墨造型尤以长方形最为常见并成为定式,其中又配以委角、直角等不同组合。另有舌、琴、瓦、碑、尺、货布、圭等形存世。

此间墨质坚细,色泽晶莹亮丽。从诸选料款上来看,墨品多为“顶烟”、“贡烟”、“五石顶烟”、“选烟”、“松柏清烟”、“五石清烟”等。特别是同属胡开文制墨家族的“胡子卿”创办人胡贞权为推陈出新,坚持以“古法”炼取松烟。自宋代以降,油烟墨已经基本取代松烟墨使用的历史大势。他又综合“油烟”和“松烟”各自优点,按照比例创造适合书画创作的“松油”混合墨。不仅如此,胡子卿墨店还放弃胡开文墨业的传统式样,而是开模雕刻了一批新颖品种。由于其产品选料、墨形的新颖别致,“胡子卿”一度广受市场的欢迎,并形成相当固定的客户群。

在国内外忧患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当时文人一方面忧国情怀继续得以保持,另一方面又渴望美好幸福生活,因而在此基础上,墨的主题图案多绘有山水风景、祥瑞之兆、如意美满等具有吉祥寓意,或表达文人志趣的尺子、货布、花卉、草木的图案。边框则多配以夔螭纹,或者极度抽象的夔纹、螭纹变形。另外由于太平天国等农民战争的影响,同治早期的胡开文墨中继续沿用了咸丰年间封建文人士大夫经世致用的政治理念,将个人“修身”与“治天下”的信念结合起来,在文人墨品中集中出现了一批描绘弓箭、刀枪、书籍组合的图案。

1 周绍良:《蓄墨小言·“鉴水斋珍藏”墨》,第538~539页,燕山出版社,1999年。

2 周绍良:《蓄墨小言·怡湘使者墨》,第574页。

关于墨名与题写文字，同样反映了当时文人的志趣与愿望。例如在吉语款中，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种：对于人/墨品、墨质进行赞誉的制墨典故：如“古隃麋”、“龙香剂”、“十万杵”等；标明家族或个人斋名的“萨尔图氏”、“棣华诗屋”、“如不及斋”等；表明个人志向的“几生修得到梅花”、“天涯何处觅知音”、“我守我黑”等；表明个人兴趣爱好及收藏赏玩的“苏耜文房清玩”、“建初铜尺五寸”等；表达吉祥与祝福的“大富贵亦寿考”、“太平有象”、“封爵铭”等；反映人生哲理的“墨磨人（非人磨墨墨磨人）”；抒发个人忠君报国思想的“捷书夜到甘泉宫”；抒发友情或兄弟亲情的“绩溪胡甘伯会稽赵搗叔权经之墨”、“方悟斋、退斋合制萑苇书屋珍藏墨”等。另外，还有引用古代诗句的“轻胶万捣元霜”，本取自元代画家倪瓒诗：“麋角万杵捣玄霜，螺制初成龙井藏”句。

此间，在胡开文各家的地名款中，通常出现“休城”、“屯镇”、“新安”、“歙州”等字样。其字体多数较规范、固定。为区分胡开文诸店之间的差别，以便各负其责，海阳胡开文老店开始在墨品侧款上大量采用“休城”款。其中以“徽州休城胡开文制/造”等款识数量为最。

#### （四）光绪（1875～1909）

属于此时间范围的休城（海阳）胡开文墨业的传人为第四代胡贞观（1826～1879；时年49～54岁）；第五代传人胡祥禾（1851～1899；时年24～48岁）以及第六代传人胡洪椿（1892～1961）。这些传人在世时间多有重合，大多历经晚清诸多年号的更替，因而在制墨风格上具有相当的延续性。故今人对于同治、光绪款胡开文墨的断代，具有相当的难度。

光绪以后，胡开文墨业的发展方兴未艾。其家族经过近二百年的变化，已从乾隆年间的两家店面发展到全国数十家店面，并由于家支的不同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特别是在光绪末年，新出现了上海“老胡开文广户氏”，其作为胡开文第五大支系充分利用19世纪末上海作为中国南方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便利条件，积极发展业务，创造出新的艺术风格，进而为海派书画艺术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此间胡开文墨按用途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般书写用墨，其选料和做工比较一般，为满足中下层文人、商贾所需；珍藏墨，虽实用价值不高，但在选料、制作上精益求精；雅玩墨，多由社会名流、高级官吏订做，广为收藏家所喜爱；贡墨专供宫廷，其选料上乘，刻模精细；礼品墨，满足上层社会交往所需，大多装潢精美，但在选烟、用料上并不讲究。总而言之，在继承和发展传统徽墨用途的基础上，胡开文墨业针对不同的需求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变化。

##### 1. 集锦墨与贡墨

胡开文集锦墨的风格在这一时期呈现出仿乾、嘉风格的发展态势——装饰设计异常丰富，几乎包括了所有徽墨的传统题材和造型，而且又新创出人物肖像、民俗画卷、诗词书法等内容。其纹饰纤巧繁缛，精美华丽，进而成为胡开文制品乃至徽墨“休宁派”中最重要的品种。此时一些知名的设计者、镌模人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不仅如此，海阳胡开文老店开始在一些集锦墨的地名款上多用“造”字而非“制”字，如“潇湘风景”、“燕京八景”等系列皆为首创。另外，胡开文贡墨开始大量供应内廷。贡墨的承办反过来又刺激了清末胡墨生产的发展。

## 2. 文人订制墨

相对于之前的文人订制墨和当时的集锦墨制作,此时店家更加注重生产成本,因而在墨质上有所下降。不仅如此,其造型不再向多元化发展,而呈现一种规范的呆滞状态,其标准造型依然为前代所盛行的长方形,另有少量碑形、舌形、扁圆柱形、柱形、圭形、砚式、饼式、砖式等以满足不时之需,而后的售价也因制模成本的加剧而水涨船高。

此时墨品的图案仍然遵循同治时期的风格,多为民间流传的典故与故事,另有如朱子治家格言、二十四孝等民俗题材,以及福禄寿喜、瓜果秋实等吉祥图案,简洁而古朴,为一时之盛。特别是在传统山水画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文人墨品,多绘有梅花、牡丹、桃花、月季等花卉题材。多带写意韵味,通体构图层次分明。除主题图案外,墨品的边框纹饰也同样精细平谨,富于线条美。它们通体构图讲究对称,有仿古夔龙纹、蟠螭纹以及卍字纹等。至于背景装饰则多为水波纹、云纹、夔龙戏珠纹等,有的高级墨品在墨额间还嵌入米珠,提高了墨的品位和实际价格。

与同治胡开文墨相同,此时的墨名题记仍具有浓厚的文人气息,如表示个人所用的“葛民方伯”;表斋名的“槐清书屋”;表对人或物赞美的“清华朗润”;表古代制墨典故的“古隃麋”、“骊龙珠”、“南海松煤”、“惜如金”、“一笏金”、“十万杵”等;表文人友谊的“召菱持赠”;表个人收藏爱好的“汉铜馨斋”、“建初铜尺五寸”、“吉富贵”、“汉建昭砖”等;表达个人心志的“聊赠一枝春”;表景色和思乡的“浔州八景”、“湖桥乡思”;表吉祥祝福的“大富贵亦寿考”、“上寿百二十”等。当然,光绪年间制墨业题材、样式趋同化明显。其质量良莠不齐,但仍有佳品出现。例如现藏于安徽博物院“秦权”墨,仿秦代法定度量衡器“权”形<sup>1</sup>,该墨反映出清代制墨业已由实用型发展为精妙的兼有装饰趣味的工艺品型;又如吴大澄“铜柱”墨,反映了当时的朝廷的外交困局,体现了一些爱国文人的忧国忧民情怀。

此时胡开文制墨署款呈现多用复合款,形成了与同治年款类似的落款方式,且落款并无绝对固定的程式。各种款识搭配、混合使用,呈现出形式新颖的特色。款识的位置分布于墨品的各个部分。例外的是选料款和墨家地名款。例如在选料款识的分布形式上,以从右到左的横款最为常见,一般位于墨品的顶端。如“超顶烟”、“顶烟”、“贡烟”、“选烟”、“清烟”、“松烟”、“五石顶烟”、“五石清烟”、“纯漆贡烟”、“极品贡烟”、“松柏清烟”等。另外,胡开文制墨家族内部一些分支的作品也具有不同的款识风格,特别是以“记”为款识的墨店大量出现,例如屯溪胡开文墨署有“屯镇”及“老”字款。芜湖的作品除有标明“×记”外,多留有“新安”一类名款。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光绪时期胡开文墨中还有“休甯(宁)”的地名款出现<sup>2</sup>。然此时的“甯”与清早中期的“寧”不同。据称用“甯”是为避道光帝旻宁(寧)之讳,故当地人将“休寧”改“休甯”或“休城”。但此说存疑:“休城”本指休宁县衙所在海阳镇,早在乾隆年间此称即已存在。如胡天注、胡余德父子分别立下的分家“阉书”中即出现了“休城”的字样。

除此以外,以“法制”为款识结语的墨品大量出现,并有不断加长、加多的趋势。

1 朱世力主编:《中国古代文房用具·胡开文人磨墨磨人墨》,第53页,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年。

2 周绍良:《蓄墨小言·“黄叶村庄”墨》,第709页;《蓄墨小言·刘世珩墨》,第772页。

### 3. 普通市易墨

光绪至民国时期,新出现的伪托名人订制墨成为主流。乾隆至咸丰时期,历代文人所制墨品今已不多见,光绪朝胡氏后人的仿制活动有助于当代人对道光之前徽墨的形制有所了解。另外,胡墨中的代表精品还有“龙翔凤舞”和“八仙过海”以及“寿星”墨等,具有工艺品之精美。特别是某些胡氏店家出品的“龙翔凤舞”墨,细微处须、麟清晰可辨,敷以金饰,则越发显得华贵无比。因而徽州墨家多有仿制,但是其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 (五) 宣统及民国(1909~1937)

此时为休城(海阳)店第六世传人胡洪椿(1893~1961)生活期间。当时休城店已经步入衰落期间。胡开文诸店两极分化明显,特别民国年间外姓人逐渐入股,涉足胡氏墨业,导致胡开文墨业名号虽在,但是光景却大不如以前。反映在款识方面,其墨落款形式尤多,且杂乱无章。其间胡墨在造型上并无明显改动,多仿同、光时期的一些大众造型。其墨多有边框,画面装饰较为简单,甚至粗糙。墨质较前朝更为暗淡。另外由于时代巨变和成本问题,出现了成本更为低廉的西洋烟料(炭黑)。

在墨品题材上,仍反映清末常见的民间喜闻乐见的题材,但无法掩饰时代的巨变。一方面,反映在旧式文人对旧时代的效忠。如清代歙县末任知县宋灿“传经世泽”墨为“宣统三年”制。此时徽墨依然作为礼物得以频频使用:一是下级对于上级逢迎,如朱家宝的“墨农选烟”墨<sup>1</sup>;二是纯粹的祝寿贺礼,如徽州休城胡开文制“百寿图”墨,是为“宣统二年”。此时仍有反映文人古玩收藏性质的“枕雷阁图”墨与“双忽雷图”墨。它们主要反映订制者刘世珩对于忽雷(乐器)的喜悦之情,皆制于“宣统甲寅(1914)九月”。前者为歙县人周仁山开设的“徽州老胡开文仁山氏”仿制,后者为“徽州老胡开文广户氏制”。风格古朴、线条纤细遒劲。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反映社会名流的生活状况的墨品。如徐世昌于“庚申年(1920)春月”从“徽州老胡开文监制”处订制的“退耕堂”和“晚晴簃”墨。又于右任“鸳鸯七志斋”墨,侧款为“徽州休城胡开文监造/民国十九年(1930)七月”。

另一方面,反映重大历史变革的现实性政治、时尚性题材开始出现,反映了新旧时代背景之下文人喜好的多元化倾向。例如在民国时期,胡开文店出现了若干纪念墨。这些纪念墨分为几种情况。一种是时事性很强的政治性纪念墨,例如“共和成立”墨,题有“共和成立千载一时,共和纪念(民国周年胡开文制)”。另外一种为店庆纪念墨,其目的是回顾祖先业绩突出本店与先辈之间的关系,以此证明其传承的正统性,进而获取更大的商业利益。如民国四年(1915)造“休城胡开文老店一百五十年纪念墨”,目的是证明其质量上乘及历史悠久。还有一种是商业合作伙伴之间的纪念墨,以此证明双方友好的合作关系。如“德馨氏学楷之墨”(新176607),为“滇省张学文订制”,“屯镇老胡开文监制”。“张学文”本为长江中游地区一著名文具店,此墨说明其与屯镇胡开文店之间的业务合作关系已经触及西南边陲。另有“海陵积善堂”墨、“梨花室”墨等,同样反映了胡开文诸店与各行业联营合作的实际情况。1915年,“地球墨”由中国农商部推荐,在巴拿马博览

<sup>1</sup> 周绍良:《蓄墨小言·朱家宝墨》,第781页。

会上获得了“金质奖章”和南京南洋劝业会的“优等奖状”<sup>1</sup>。胡墨在国际上获奖,给沉闷的民国制墨业吹入一股清新之气。

## 二 伪年款的类型表现与辨识

以上仅就目前所见故宫藏真年款胡开文墨做一简要概述。除此之外,故宫及社会上还有大量伪年款胡开文墨存世。以下仍举数例说明这种情况。就故宫所藏胡开文墨的存世情况看,被视为伪年款的胡墨实物,涵盖了从乾隆到光绪各时期的作品。

### (一) 乾隆(1736~1795)

生活于乾隆时代的胡开文墨业主人有胡天注(1742~1809)及其二子胡余德(1762~1845)、七子胡颂德三位。这一时期传世的胡开文墨极为罕见,目前仅有后世仿制品存世。此时胡开文墨业在徽州地方上仍默默无闻,产品销售对象仅为社会底层人群。其之所以在休宁县学(海阳)附近开设总店,是因为销售对象是未及第学生且距离原料产地(休宁与婺源交界的浙岭)不远;其之所以在屯溪开设分店,是因为胡氏考虑到此地紧邻新安江畔,利于商品流通,故而将销售对象集中于徽州商人。胡开文在创业之初没有名气,只能依靠老丈人的招牌逐渐过渡,并节省了相当部分的刻模成本。以上事例皆说明当时的胡开文并不出名,乾隆时期的朝臣尚无必要由胡开文制造御墨。从这一方面而言,胡开文在创业之初所针对的销售群体是符合制墨业发展规律的。

#### 1. 依据内务府图稿进行仿制

在款识中加干支纪年的做法,是宫廷御墨的落款方式,目前常见于乾隆年间内务府造办处墨作、御书处所制墨品。例如“四库文阁”诗墨,一套5锭,形状各异。分别镌有十二辰、文渊阁、文津阁、文源阁、文溯阁诗图。后四锭墨正面的御题诗后均有“臣彭元瑞敬书”字样,墨左侧面均有阳文“大清乾隆年制”六字款。此套墨墨质细腻,其正面御题诗均为描金小楷,背面所雕亭台楼阁画面纹路清晰。内务府不可能委托一个在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地方墨工进行如此庄重的文化活动。事实上此套墨模仍是从内府中流传至徽州制墨作坊,后代制墨家仿制而成。光绪年间,胡开文聘请泾县刻墨艺人王绥之翻刻而成<sup>2</sup>。又“鱼戏莲墨”,一侧楷书“乾隆年制”<sup>3</sup>。又“麒麟仁兽”墨,侧题楷书“乾隆年制”,字体工整、有力。此锭是集锦套墨“瑞庆图”中的一式。有人认为此墨是胡开文传世极少的乾隆年制墨,反映了胡开文墨店初期的制墨水平,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sup>4</sup>。然而根据胡开文墨店在乾隆中期才刚刚创立,根本无力与“歙派”徽墨相抗衡等历史事实,此墨应该为后世胡开文墨店的仿制。

1 朱世力主编:《中国古代文房用具·胡开文地球墨》,第55页。

2 石谷风编:《徽州墨模雕刻艺术·御制四库文阁诗墨模雕刻艺术》,第2页,黄山书社,1985年。

3 朱世力主编:《中国古代文房用具·胡开文鱼戏莲墨》,第51~52页。

4 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编:《文物藏品定级标准图例·文房用具卷》,第181页,文物出版社,2008年。

## 2. 假托文人订制墨

故宫尚有孙蟠订制的仿宣和式“乐老堂录古训墨”、“小巫山樵书画墨”两锭，其侧款分为“徽州休城胡开文制”和“徽州胡开文法制”。20岁的客人孙蟠（石舟）向4岁的店家“胡开文”订制墨品，实乃笑谈<sup>1</sup>。由于孙蟠算得上清代一位比较知名的文人，他也曾向多位制墨家订制墨品。故而胡开文的后人以孙蟠的名义假托制墨，谋求更大的经济利益亦有可能。

## 3. 同、光以来胡开文各家支用来标榜各自墨店的正统

周绍良先生在《蓄墨小言》中记载了砚形墨一锭，其侧款分别为“乾隆三十年造”和“徽州胡子卿制”<sup>2</sup>。此墨实为“胡子卿”墨肆所制。反映的问题却是胡贞权、胡祥振父子对休城店主胡贞观垄断胡开文墨业的极端不满，他们试图通过标明“乾隆三十年”的仿古手段来证明胡子卿墨店的历史悠久，从而为胡贞观、胡祥禾父子打破胡贞观的垄断地位。

另据传说，从胡天注开始接手“汪启茂”墨肆，胡墨曾在款识上出现一种情况，即“汪启茂”与“胡开文”并现于一墨。如有“大国香”墨一锭：一面“休宁汪启茂制”，一面“大国香”，下刻“苍珮室”方印，侧款“胡开文监制”。此墨虽无“乾隆”字样，但是按胡开文家族史，胡开文墨业的创始者胡天注原本是休城“汪启茂墨店”老板的女婿，且乾隆年间的汪启茂墨店在徽州本地亦不十分出名，并因经营不善而倒闭，后被胡天注所继承。而在此墨中按照文意：是胡开文开设在汪启茂之前，且后者仍然能够在前者监督下进行生产。这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故而只能是后人伪托之作。总而言之，以上这些具有“乾隆”年款的假托墨品，无一不是在说明胡开文墨业开办的时间，从而间接的为学术界准确地鉴别胡开文墨的具体开创年代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不仅如此，它还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老一辈徽墨收藏家的错误。例如张綱伯先生曾在其收藏的胡开文款“天膏”墨包装锦盒的内衬中写道：“此二墨为同一时期所制，推定为乾隆晚期——胡星聚移屯溪——胡开文创始人天注原驻屯溪。二由康熙传乾隆，二则开业于乾隆四十七年，可见当时风尚……大有参考价值。”此间张綱伯先生首先认为胡天注是胡星聚的后人，其次认为胡开文“开业于乾隆四十七年”，而事实并非如此。

## （二）嘉庆（1796～1820）

活跃于此朝的休城（海阳）胡开文业主为第一代胡天注；第二代胡余德；第三代胡锡熊（1803～1862）。但此时胡锡熊年幼，尚未登上历史舞台。虽然真正属于嘉庆朝胡开文墨的文物是否存在尚有疑问，但从现有仿嘉庆款胡开文墨推断，此时的胡开文墨多仿宫廷设计图稿，并以制作集锦墨最具特色。其作品以锭数较多而著称。

胡开文最为经典的“御园图”墨选材于当时京师大内（紫禁城）、西苑（中南海、北海）和圆明三园（圆明园、长春园、万春园）等几座皇家园林的景致，并以虚实相间的手法将各处景点精细描绘而成，共64锭。每锭皆有题名及“嘉庆年制”款识。其字体端正规矩，笔画平直，笔道粗细均匀。又安徽省博物馆藏“御园图”

1 故宫博物院“徽墨胡开文研究”课题组：《胡开文款“乾隆小巫山樵书画墨”制作年代的再探讨》，《黄山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2 周绍良：《蓄墨小言·胡子卿造砚形墨》，第154页。

墨模,据说为嘉庆年间原制品<sup>1</sup>。此套集锦墨模各锭构图严谨,雕刻工致,刀法娴熟流畅,藏锋清楚,表面光滑,保持了乾、嘉时期宫廷制墨的风格。据称此套御园图画稿,应是内府画工之作,而后发往徽州墨坊命制<sup>2</sup>。因而此后历代制墨家多有仿制。如曹素功所制“御园图”仍存于世。这套墨模虽具嘉庆年款,但历代胡开文在不同年份屡有翻刻,并作为市易墨的最高等级上市销售。因此,它的确切刻制时间以及何人所刻,尚难确指。

另有“老干凌云”竹式墨,史上多有制墨家进行过仿制,如其中署“胡开文”者一锭,一面“老干凌云”,一面“嘉庆庚午年(1810)长白虞臣制”,侧款为“徽州屯镇老胡开文造”。按“徽州屯镇老胡开文造”是屯溪胡开文墨店正式独立经营之后出现的墨品标识,它与休城胡开文店的正式分裂是在同治初年。墨中所记“嘉庆庚午”时期乃胡天注已逝,胡余德作为胡开文墨业第二代传人主持休宁、屯溪两店业务之际。据晚清胡开文家规:“屯店本不起桌,所卖之墨向系休城店制成发下。……屯店代休城店办买各货,……屯店起桌自造,更换‘胡开运’招牌,不得用‘胡开文’字样。”<sup>3</sup>由此可见,胡余德作为家规的订立者,其在世期间是绝对不允许屯溪胡开文店“起桌”自造的。虽“老干凌云”有可能在嘉庆年间被当作订制墨出现于世,但是从款识上来看却是后代仿制的。

### (三) 道光

胡余德是胡开文墨业的开拓继承发展者。1809年胡天注去世,1810年的《绩溪县志》仅载有汪近圣墨业,而不见胡开文墨业的记载,可见胡氏墨业尚属平平。直到1828年邑人户部广东司主事兼办云南司事胡培翥(1782~1849)劝募兴建东山书院时,胡余德才以一千两白银认捐,促成了东山书院的创办。此举才间接说明了此时的胡开文已事业有成,声名大显。故族谱中有言:“吾族自三十世以前经商者颇少……逮道光(光)咸(丰)年间,端斋(胡余德)公起,遂以‘开文’墨业名天下。”<sup>4</sup>故宫收藏有一件“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墨,背面有楷书三行:“道光初元,孟夏朔旦;二曜璧连,五纬珠贯。七政丽天,辉腾云汉;纪诸隩糜,扑欢颂赞。新安胡开文谨祝。”侧隶书:“辛巳四月初一日”。此墨本为徽墨婺源派传人詹应甲所制:詹广桃(1760~1841),字鳞飞,号湘亭。其父詹国淳(从先),詹成圭墨肆第四代传人。其墨被称为詹成圭墨鳞飞氏或詹应甲墨、赐绮堂墨。詹广桃一般以官员身份名于史册。詹应甲墨中最知名的贡墨,当属“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墨,曾被大批收贮于清宫懋勤殿。“道光辛巳”为道光元年(1821),此年有天象奇观出现,作为臣子,詹广桃作墨以示吉兆之纪念。由于徽州墨家题材重复率极高,故利用如此天象吉兆以应节之墨不在少数。周绍良之说恐过于片面<sup>5</sup>。

1 石谷风:《徽州墨模雕刻艺术·御制铭园图墨模雕刻艺术》,第38页。

2 朱世力主编:《中国古代文房用具·胡开文御园图集锦墨》,第68页。

3 张海鹏、王廷元:《徽商研究》,第567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

4 (清)胡祥木:《(绩溪)上川明经胡氏宗谱》上卷之中,宣统三年(1911)木刻本,上海市图书馆藏。

5 周绍良:《蓄墨小言·“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墨》,第422页。

#### (四) 咸丰

所谓“新安胡开文”者，在模仿前代墨品的题材上较为出众，如屈默成“铁如意”墨，周绍良先生认为有疑：“……可见当时士大夫都把这铁如意视为重要文物。如果屈默成真的重得赵宗建原藏，而不能自己创式制墨，却依旧样仿制，并使用杨沂孙为赵宗建所作铭文，未免有盗用翻刻之嫌，失去好古之风采矣。所不解之另一端，同治十二年，杨沂孙尚在，赵次侯似并未死，同意如此做耶？抑屈默成冒为之耶？”<sup>1</sup>另有“休城胡开文”者亦不甘落后。例如“东溪刘氏介封选烟”墨，有“咸丰元年（1851）制”字样，又“宜书宜画”墨，一面为“宜书宜画（古黟南屏李氏珍藏）”，一面为“咸丰丙辰年（1856）制”字样。据前文所涉及胡开文家族史实之“休城”字样者，以上几锭皆为后世伪托。

#### (五) 同治、光绪

同、光时代是胡氏制墨伪托年款的高峰时期。突出反映在两点：

其一，订制者与制造者年代不符。对此周绍良先生多有论述。如“萑苇书屋”墨，系方鼎录、方鼎锐兄弟合制墨。其墨署有“同治九年（1870）方悟斋、退斋合制”字样，侧款为“徽州休城胡开文造”。周先生经过对方氏兄弟的考证，认为“此墨制于同治九年，不知其任何职也。”<sup>2</sup>另有袁昶“大富贵亦寿考”墨，侧款为“同治甲子（三年，1864）冬”及“歙州胡开文造”。据周绍良先生考证，此墨纪年“下距其中进士尚有十三年，果何因而制此墨？思之殊不可解。”<sup>3</sup>又有一件“黄山”瓦式墨，仿明代方于鲁所制“黄山墨”。正面上端镌刻一瓦形“黄山”二字，下做行书三行：“烧松烟，摹汉瓦，价无价。洪钧持赠。”下钤小印“仿古”二字。俱阴文填金。背面有行书三行：“同治六年（1867）之冬，徽州胡开文正记，仿方于鲁无胶超等松烟加十万杵。曹镛臣监造。”按“胡开文正记”本为1914年由曹镛臣在安庆设立的墨肆。此时距离同治六年约40年时间，故而这墨为民国作品。

其二，制者只在墨品上标识干支款以混淆墨品的制作年代。这种款有的只带有干支纪年，如“乙未”、“壬辰”等，而无具体帝王年号。也许是当时人觉得没有必要，也有可能是有意而为之。如安徽省博物院藏“人/磨墨磨/人”墨，人形，高8.6厘米，重36克，一本色，一漱金。前胸篆书：“人/磨墨磨/人”；后背楷书：“乙酉首夏/肖琴甫倩/胡开文造”<sup>4</sup>。遍查胡氏墨业发展的时间跨度，属于“乙酉”的年份分别为1765（乾隆三十年）、1825（道光五年）、1885（光绪十一年）。据其风格、品相，乃工艺品墨，不可能为草创，当为同光时期制品。尽管墨品订制人的身份及墨品所制年份尚待考证，但是制墨家在墨品上只标明一部分年份的举动，无疑是要从另外一个方面彰显本店之正宗。故宫博物院藏有同样的人形墨，其造型与安徽博物院所藏相同，唯款识为“徽州休城胡开文造”，由此可知此墨为同、光时期流行墨品。

1 周绍良：《蓄墨小言·屈默成“铁如意”墨》，第569页。

2 周绍良：《蓄墨小言·方鼎录、方鼎锐墨》，第590～591页。

3 周绍良：《蓄墨小言·袁昶墨》，第608页。

4 黄秀英、汪庆元：《胡开文墨业考》，《东南文化》，2003年第9期。

### 三 伪年款大量出现的原因

清代及至民国时期胡开文墨品上的店名、人名内容极其庞杂难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此举是在胡开文制墨家族内部的统一行为。早在胡开文墨业开办之初，创始人胡天注便规定把“老二房”休城（海阳）店作为唯一的生产基地，“老七房”屯镇（屯溪）店作为分店而存在。目的是保证墨品的质量。日后胡余德作为家长再次主持分家，重申了以上原则。然而胡天注的子孙从“德”字辈开始至“贞”字辈数代间，一直为其他各房能否用胡开文字号“起桌”做墨之事争执不休。在这种情况下，在“休城胡开文”店务由胡贞观主持时召开了胡天注各系房会议，重新议定：胡天注派下子孙均可利用“胡开文”字号起桌做墨，但须以“记”字区别，以示各负其责。此规既出，各家支后裔才可以合法有自己的专营，并对于各自的产品做质量保证，故易为众人接受。于是到光绪末年，胡开文墨业已经发展为五大支系（休城胡开文、屯镇胡开文、芜湖胡开文沅记、休城胡子卿、上海胡开文老广户氏）。当时各家支在全国各地拥有数十家店面并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这些墨店不仅有彼此相互独立的品牌商标、原料基地、加工工厂，还有连锁经营的销售门市部。各家支胡氏子孙既受到封建家法束缚，又想在经济活动中体现个人价值、获得个人利润，故而很可能在墨品的款识标注上下工夫，这样便可以做到左右逢源。无论是仿制还是冒名，其目的都是为了追溯祖先荣光，使得经济利益最大化。事实上，那些被仿的真正精品文人墨皆属于个人消耗物品，除了少许送人外，一般不会刻意保存。即便有少量流出，也应是损伤无用之器。然各家支从借助名人效应出发，其仿品的造型、字体、装饰皆极力复原之，仅有墨侧的家支地名款之细微区别，故而新品仍不失原物之余韵。

### 四 结 论

款识虽是墨品上的附属物，但由于它深刻的文化艺术内涵，因而是徽墨鉴定中一个很重要的依据。晚清至民国期间大量出现的胡开文仿制墨题材相同或相近，明显非一店、一时、一人所为。有理由相信这些具有款识的墨品，实为同一地区的不同兄弟店铺或者是同一店铺的不同父子传人所制。因此，鉴别墨的真伪绝不能只凭墨品所署款识而武断地定论。除须对不同时期墨的造型、纹饰、工艺技法等有所了解外，还要把握徽墨款识的内容、风格以及相关历史背景知识。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器物部]

(责任编辑：陶晓姗)